

## 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的外国名言



□ 杨 路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应邀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习近平总书记在演讲中深入阐述中国对当前世界形势的看法和对国际关系的立场主张，呼吁各国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演讲结尾，习近平总书记引用俄罗斯谚语“大船必能远航”，表达了对中俄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的坚定信念。

俄罗斯地跨亚欧大陆，广袤的领土涵养了兼具东方与西方特质的独特文化。在悠久的历史岁月中，俄罗斯涌现出普希金、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这些文学巨匠共同创造了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使之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文学之巅。俄罗斯文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成为一代代青年人的文学启蒙。俄罗斯文学倡导“文学是人性”的观念，即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展示人的特质。这一思想对五四运动时期进步作家的文学观产生积极影响，鲁迅、茅盾、沈从文等文学大师都曾大力推崇并身体力行“为人生”的文学观念，创作出一系列展示社会普通大众和底层人民生活的伟大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作品被大量翻译成中文，成为中国读者书架上的必备读物，在一代青年人中塑造了浓浓的俄苏文学情结。作为思想有深度、文化有厚度、作品有高度的文学国度，俄罗斯不仅拥有熠熠生辉的艺术作品以及不朽的著作诗篇，还流传着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谚语警句。谚语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它以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特点发挥着启迪大众、教化人民的作用。相较于高雅、深邃、厚重的文学作品而言，谚语往往轻松诙谐、雅俗共赏，因而在生活中更加流行。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大船必能远航”便是俄罗斯民族智慧的凝练，它出

自俄国伟大批判主义作家果戈里的经典喜剧《钦差大臣》里的人物对白，正是因为这部妇孺皆知的戏剧，该谚语成为俄罗斯人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颇高的金句。它的字面意思为大船一定能够航行到很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句谚语加以理解。一是对大船的赞美。在俄罗斯人看来，大船船体足够坚固，能够有效抵挡海上风浪的侵袭；大船储备足够丰富，能够有效应对长途跋涉的考验。因而只有大船才能够行得更稳，走得更远。二是对远航的渴望。远航代表着成功，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界的征服。对于渴望获得出海口的俄罗斯人而言，深海是危险而又充满诱惑力的地方：一方面海洋深处风高浪急、变化莫测、危机四伏，随时可能吞噬一切生灵；另一方面，征服深海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足以彰显人类的伟力。经过生活的演绎，在当下俄罗斯语境中，大船往往指代出类拔萃、志向不凡的人或事物，远航常被用来形容伟大的事业或者不朽的功勋。人们用这句谚语勉励或者祝福志存高远、能力出众的人必能无往不利、披荆斩棘，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在俄语社会中，“大船必能远航”是一句分量很重的祝福，它既包含了对被祝福对象个人能力、智识水平和意志信念的认可与赞美，又表达了对其目标和事业艰巨性、正义性和伟大性的推崇与景仰。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古诗文都同“大船必能远航”遥相呼应。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奋勇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度，引用中国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的千古名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作为呼应，表达了对中俄两国同舟共济、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美好愿景，以豪情万丈的姿态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自信豪迈、一往无前、建功立业的精神特质。李白是中华文化代表性人物，他天资聪颖、才华过人，虽然一生几度大起大落，但始终乐观自信、百折不挠，遍

访名山大川，探索奇险之境，书写了一首首雄奇壮丽的诗篇，最终成就诗圣的美名。某种意义上而言，李白的一生便是“大船必能远航”的写照。和俄罗斯民族一样，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伟大的征途总是荆棘密布、险象环生，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远古神话故事深刻地阐释了伟业难成的道理。然而，前途愈是坎坷、挑战愈是艰巨，中华民族便愈能迸发出顽强的斗志与必胜的信念。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成功不是随便得来的，而是需要“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以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坚毅。正如李白诗中所言，成功者一定要不畏困难，勇于在风高浪急之际鼓起风帆，终将驶向胜利的彼岸。

用船的意向来形容中俄两国可谓匠心独到。作为全球性大国，中俄皆是名副其实的大船，近百年来两国历经风雨，劈波斩浪，始终勇立于世界的潮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展现更多责任担当。因而在远航的过程中，大国不仅要渡己，更应与他国携手共渡，甚至要渡他于危难之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正在进行深刻的调整，可谓是风急浪高、沧海横流。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中国一再呼吁世界各国携起手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典范，中俄两国同舟共济，以一往无前的姿态坚定、自信地驶于世界大潮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成功访问俄罗斯开辟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中俄两国政府高度重视两国关系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将中俄关系打造成互信程度最高、协作水平最高、战略价值最高的一组大国关系。两国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不断提升中俄关系政治定位。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8次访问俄罗斯，普京总统9次来华，两位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晤30余次，通过电话、信函交流百余次，开创了元首外交新高度。2019年6月5日，在中俄建交70周年之际，两国宣布将中俄关系提

理念，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精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引向新阶段，塑造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象、中国风采。

### （三）

马克思主义不是为某个集团或阶级代言的“私器”，而是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而斗争的“公器”。正如马克思所說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代表人民、为了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所在。

一是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圣经”。在马克思主义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探求自由解放的道路，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使人民看到了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希望。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践行着“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恰恰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才会赢得人民发自内心的信服，中国共产党才会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是马克思主义植根于人民，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主体的唯物史观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伟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人民是阅卷人”，坚持“江山就是

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标志着中俄关系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2021年6月28日，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之际，中俄元首共同宣布决定《条约》延期。双方以切实行动强化政治和战略互信，成为当今世界大国、邻国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

中俄政治关系的不断升温为两国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打下良好的基础。2013年以来，中俄经贸合作规模与质量齐升，合作领域不断扩大。2018年以来，中俄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在双边贸易繁荣背景下，中俄在金融、投资、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合作全面开花。作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内容，人文合作在增进中俄民众相互了解、传承中俄世代友好、巩固中俄关系社会和民意基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2013年以来，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正迈入更加成熟稳固的重要阶段。教育交流是人文合作的重要支柱。截至2020年，中俄双向留学交流人员超过10.4万，双方成立了12个同类大学联盟，覆盖636所学校，为两国青年学生学术交流、科研攻关以及创新创业提供丰富的平台。文化交流是人文合作的主要载体。近年来两国专业艺术团、剧院、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建立常规合作机制，举办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一系列主题文艺活动，不断深化文化艺术领域人才培养和交流。与此同时，中俄地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许多文艺合作项目落地生根，彰显了两国人文交流强大的民间基础。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中俄始终并肩、背靠背紧密合作，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展望未来，在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的伟大途中，相信两国将继续凝心聚力，携手共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开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带领人民群众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依靠人民夺取了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大胜利，再次深刻揭示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

三是马克思主义合乎人民利益，人民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马克思主义从不侈谈抽象的利益，更不以抽象利益为幌子牟取自己“不变的利己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利益”是人民的利益，是群众可感可知可享的“生存利益”和“生活利益”。一百年来，我们党的全部奋斗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使中华民族千年夙愿成真；奋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得到实实在在地巨大提升。

马克思主义既是立足当前又是面向未来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立足新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指明了中华民族发展的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在这一伟大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必将不断变为现实。

（作者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资本论》是一本政治经济学的鸿篇巨制，也是“社会病理学”的经典之作。马克思在书中引用英国当时《公共卫生报告》40多次，详细描绘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被压迫和剥削的悲惨现实，深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理机制。通过引用公共卫生医学数据，尤其是工人在瘟疫中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马克思敏锐诊断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公共卫生危机之间的逻辑关联，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制度成因，也为我们克服各种困难、更好应对公共卫生危机提供了治理镜鉴。

### （一）

19世纪60年代前后，当马克思在伦敦潜心阅读、构思写作《资本论》时，正值英国频频暴发霍乱、肺炎等瘟疫。迫于民意和舆论压力，英国逐渐探索、建立起最早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报告》的作者约翰·西蒙，是当时英国公共卫生建设的积极推动者。从1859年到1876年，西蒙先后完成并出版了16份《公共卫生报告》，详细记录了那个时期英国公共卫生体系的状况和改革的举措。从1860年到1863年，西蒙对纺织工人、农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卫生环境进行了细致、广泛的调查，有力地证明了瘟疫暴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性的，劳工阶层集中居住的贫民窟成为疾病流行的中心。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查阅资料时阅读到了这些报告，盛赞其为“划时代的报告”，认为它们揭示了很多被官方政治经济学隐瞒的事实和真相，特别是18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工业野蛮发展导致瘟疫蔓延的时代景象，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马克思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数字和硬邦邦的规律，而不关心具体的、鲜活的人。人只是理论假设中的“经济生物”，是商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评当时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马一样的对象考察，把人抽象成财产主体，由此取代了人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资本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出发点和归宿处，是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马克思对《公共卫生报告》大篇幅的引用，正是为了与以前那些“目中无人”的研究方式决裂。通过约翰·西蒙笔下那些触目惊心的工作环境和生活场景，马克思生动揭示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与受到压迫的工人之间的矛盾，进而诊断出“工业病理学”的病症所在。工人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瘟疫横行、疾病频发、寿命减短等惨象，根源在于其工作条件恶劣、营养状况贫乏和超长劳动时间。不从制度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改变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仅仅依靠改善房屋、供水、下水道等市政举措，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卫生危机，注定会“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

道德上的同情和怜悯，在面对疫情灾难时，无法提供实质性的帮助。马克思强调，“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但是“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要想破除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解决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常地必然再产生”的“毒疮”，必须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从问题表象深入到矛盾根源，在生产制度和社会结构之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制度成因。

### （二）

在唯物主义这把手术刀的解剖下，马克思找到了资本主义公共卫生危机的病理学根源，特别是准确锚定了其制度成因。

首先，制度价值的导向错位。资本主义将资本增值放在第一位，而将人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二位。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资本主义第一时间不是去考虑工人的生命健

## 从《资本论》看西方的 公共卫生危机

□ 肖红春 徐宏 李凌

康，而是资本如何保值增值，因此在防控疫情时总是那么犹犹豫豫、消极被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强调的，“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

其次，制度结构的内在缺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自身运动过程中，为了扩大利润率，不可避免地对工人的劳动条件、生活资料进行克扣，也不可避免地保持一支失业的产业后备军，这都为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做不变资本实用上的节约，从而看做提高利润率的手段。”这种不人道的悲剧，再次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

最后，制度效能的严重内耗。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医疗卫生机构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用来保持工人劳动能力的工具存在。当公共卫生危机发生，工人们需要医疗卫生服务保持其劳动能力时，资本方更多地考虑的是资本的保值增值。一旦采取有效防控举措可能影响资本的增值时，既得利益群体就会通过各种方式对疫情防控施加影响，左右专家的科学研判和政府的行动节奏。在整个社会最需要医疗资源时，资本主义国家及其医疗卫生体系不仅难以发挥专业优势，还可能成为削减的对象、选举政治的筹码。这也恰恰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医疗卫生预算不升反降，疾控部门负责人被撤换，医疗科技创新优势难以凸显的根本原因。

### （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肆虐，由于资本主义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存在的价值错位、制度缺陷和效能内耗等局限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要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

马克思的“工业病理学”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同时，向我们揭示了战胜瘟疫的制度和精神优势：坚持生命健康而不是资本优先、注重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尊重医疗卫生体系的专业精神。这些理念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高度一致性，说明了伟大抗疫精神与马克思的思想一脉相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只有继续秉持伟大抗疫精神，我们才能在与瘟疫大流行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

